

史诗片《建国大业》中，旧上海黑社会教父式的人物杜月笙装腔作势地闪现了几分钟。在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时，杜月笙和他那光怪陆离的时代被送进历史档案馆。

# 杜月笙最后的选择

■谢国平



杜月笙

1949年4月27日夜，人民解放军围攻上海的前夜，“海上闻人”杜月笙悄悄地登上了一艘荷兰轮船，还有他一家老小包括京剧演员孟小冬逃离上海。轮船经过吴淞口，浦东高桥近在眼前。47年前，他一个街头“小瘪三”从那里走进大上海，在刀光剑影中创下了荣华富贵，如今随着滚滚浊涛一去不返。重病在身的杜月笙此时已全无黑道大亨的气派了，他久久伫立船头，黯然神伤。

解放上海的炮声似乎已经在耳边响起，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，国民党节节败退。一个新中国指日可待。在上海滩争斗了一辈子，杜月笙总算看透了蒋介石政权的卑劣腐朽，愤恨与日俱增。他对密友范绍曾说：“沦陷时上海无正义，胜利后上海无公道。”还说：“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，秩序也比较好，国民

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，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。”甚至还蒋蒋介石拿他当夜壶，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。

1948年，蒋经国到上海“打老虎”，将他的儿子杜维屏以投机倒把罪逮捕，判了六个月的徒刑。这在以前，谁敢动这位上海黑社会教父一根毫毛？

此前，杜月笙跟他的浦东同乡黄炎培以及章士钊、史良、张澜等著名人士频繁接触，商讨时局，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。上海滩另一“大亨”黄金荣经多番工作，已决定留在上海。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。但杜月笙不能不考虑自己的一身血债：1927年4月11日夜，他诱捕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，将其活埋于荒野。次日，他和黄金荣、张啸林共同指挥1.5万余流氓挑起了一场大屠杀。

他的朋友，当时的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提醒过他：不要忘记民国16年“清党”的时候那一幕，你杀过什么人？建议他一定要离开上海，即便不去台湾也得走香港。

确实，在杜月笙黑道生涯中，1927年的“四·一二”政变是一个转折点，之后杜月笙仿佛跳过了一座龙门，蒋介石继聘他为司令部参议之后，又聘他担任“国府谘议”，一个流氓竟然有了少将军衔！他成了上海滩上唯一一个势力遍及法、英、华三界的大亨人物，党国要人陈群、杨虎等和他称兄道弟，一些党部委员、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做“先生”。

更可悲可怕的是上海滩上那些从不与“下三界”（流氓、赌棍、烟贩子）打交道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物，也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，接连抬他出来担任一些要职，如“法租界商界总联合会”主席和“纳税华人会”委员兼首席顾问。不久，法租界华董空缺，中外阔佬又捧他登上了5人华董首席的宝座。

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殊关系，杜月笙还相继担任了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董事，浦东、国信等银行的董事长，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。到抗战前夕，上海滩上请他列名为董事、监事的银行、钱庄、信托公司多达70

余家。黑帮老大竟然穿上了一件“金融家”的长衫。而一向高傲的上海工商金融界在被蒋介石政府逐步控制的同时，也被黑社会逐步蚕食。

但历史终于要翻开新的一页。黎明前的黑暗中，不可一世的杜月笙也会感觉到没有出路了。蒋介石曾召见他，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，不要犹豫。但反复权衡，杜月笙决定远居香港。

此时从上海来到香港的还有一大批工商业人士。这些与国民党政府渊源深厚的金融工商巨子到了香港再也止步不前。蒋介石再三再四叫他们去台湾。但他们对蒋介石失望透顶，蒋介石连年内战榨取了他们不少钱，可国民政府仍是腐败之极；蒋经国在上海“打老虎”，还差点将他们打进去，如何叫他们咽得下这口气。

杜月笙抵香港不久，共产党方面立刻对他展开了统战工作，争取杜月笙重回上海，这其中有一层最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当时上海金融领袖、工商巨子也纷纷跟着杜月笙转移，他们挟巨资而抵香港。无形中，滞港的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围在杜月笙周围形成一个“南下集团”。他们处在踌躇与观望中，遇事集体商量，关键时刻愿意听杜月笙“一句闲话”。

历史最后也给了杜月笙一道选择题，向左还是向右？

一个黑社会老大也曾为社会做了些事，杜月笙浑浊的历史中也曾有一丝青色。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杜月笙发起组织“上海市各界抗战后援会”，还把他的门生花了30余万美元造的公馆，作为“劝募委员会”的办公地点，仅月余时间，就募集救国捐150余万元。他还自任上海市民劝募总队队长、上海商界劝募总队副队长。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，几占全部发行量的1/6。

杜月笙还个人出资1万元购买一辆装甲车送给淞沪战场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。1937年10月杜月笙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，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。“八·一三”抗战，杜月笙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品时，仅用了一天时间即向谢团送去了光饼20万只。他甚至不惜巨资购买《西行漫记》、《鲁迅全集》等进步书籍，烫上“杜月笙赠”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，支持抗日宣传。

杜月笙身上的是非曲直，相互矛盾的东西很多，因为是黑帮老大，显得让人难以理解，其实，就在他的人生最后一年，他也是在自我矛盾中难定前途。《剑桥民国史》称，杜月笙是上海最难以认识清楚但最有势力的华人。

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、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

联系，并派金山、章士钊等人赴港，劝说他返回上海。在党的统战政策感召下，杜月笙的好朋友、上海金融工商巨头如王晓籁、刘鸿生、吴蕴初等人，都已打定主意北上。

对此，老谋深算的杜月笙表示，因身体欠佳暂不能回大陆，但遵照潘汉年“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”的指示精神办事，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，也不打算去台湾，并托人带口信回上海，要留在上海的徒弟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，安分守己，报效国家。

据说，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清楚地记得，杜月笙当时准备回上海定居，托《新闻报》总编钱永铭给毛主席写信。信写好后这位喝醉酒的朋友却装错了信封，把给毛主席的信错装到给蒋介石的信封里了。就这样，共产党没有看到杜月笙的回信，而蒋介石看到杜月笙有回归上海之意后很生气，这件事情留下了千古遗憾，回大陆成了杜月笙未了的心愿。当时是1949年，杜美如19岁，应该有一定的记忆力。但史家多以为此乃一家之言，有待考证。

杜月笙不愿意去台湾，国民党便有意让杜月笙在



杜月笙和五太太孟小冬

港为台湾方面做事，如聘请他为“救国公债节约储蓄券港澳劝募委员会主任委员”，想以杜氏之威望，帮蒋氏政权搜刮港澳同胞钱财，杜亦未答应。

台湾来的“国民大会”秘书长洪兰友等人，不断联系杜月笙，做说服工作。在蒋介石的心目中，杜月笙最大的利用价值，就是拴住旅港的上海工商界人士，不让他们连人带钱重返上海。

1950年清明过后，北京中国银行准备在京召开董监事会议。杜月笙等在港的一批金融巨子原都是中国银行的董事，考虑到这批人的特殊身份和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，共产党特地派人赴港，邀请他们返京参加改组会议。

去还是不去？这批银行家们拿不定主意，问计于杜。杜月笙也是圆滑，说：“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要采取一致立场。目前纵不可能去北京，但我们可出具委托书，委派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。”

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。消息传出后，震惊中外。后来史称“中行事件”，台湾方面对杜月笙极为不满，蒋介石更是震怒，将部下骂得狗血喷头，并派人前来质问，杜月笙仍是“闲话一句”，说：“坚持立场。”后来杜月笙病逝香港，蒋介石迟迟不作表态，也与此事有关。



杜月笙及门徒



冯小刚（饰杜月笙）与陈坤（饰蒋经国）

到港不久，潮湿的气候，一路劳顿，受了风寒，加之心情不好所致，杜月笙的哮喘病复发。一代大亨的最后岁月，几乎是在病榻上度过的。而在经济上，杜月笙也极为拮据，进入1951年夏，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，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。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留给家人只有11万美元。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，是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，宋子良代为投资，略有赢余。

1951年8月15日，一场强台风挟着暴雨掠过香港，当年叱咤风云的杜月笙，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。次日下午，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他的骨灰葬在台湾汐止，而他的遗愿是在故乡浦东高桥入土。

入殓时，杜月笙的“治丧委员会”主任钱永铭把一本圣经放进并非基督徒的杜月笙棺材内。扉页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：

这本圣经是我们的好友吴德生兄译成中文，是中文圣经中最好的一本书，我与你都非基督教友，可是在你临终时，赵牧师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你说了好几遍：“耶稣救我”，“耶稣救我”，因此我把这本圣经送给你，在你进入天国的路途上可以诵读。

有了钱永铭送的《圣经》，杜月笙是否就能进入天国，人们不得而知。但钱永铭写的这段话，也反映了杜月笙死前的空虚、绝望之情。

杜月笙虽然最终没有回到大陆，也没有去台湾。几经沉浮，杜月笙最后没有成为蒋家王朝的“忠臣”。解放后，共产党人迅速肃清了盘踞上海近一个世纪之久的黑社会势力，杜月笙和他那光怪陆离的时代也被送进历史档案馆。

编辑 / 秋水